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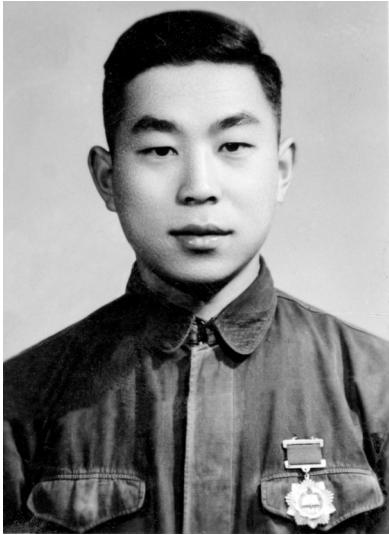
移民岁月

第二十四期

YI MIN SUI YUE

上海文教大队支宁老师李文元（一）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李文元。(照片由本人提供)

1932年出生的李文元老师，今年已经89岁，进入了耄耋之年，但年龄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追寻前沿时尚的兴致。手机玩得很转，微信、短信、手机视频等全无障碍，他给自己起的微信名是“幸福老头”。2020年4月13日和4月20日，我们两次采访了原上海文教大队李文元老师。听他给我们讲述来宁的故事。

李文元老师家里的墙壁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老少三代14口人。每个人脸上都透出幸福满满的笑容。但62年前，李文元只身来宁夏时，错划右派的身份让他充满了委屈，也摧毁了他多年来努力工作取得的骄人业绩，在严酷的政治高压环境中他敢怒不敢言。离开繁华的上海时，父母怕他到西北受冻，连夜赶做

的一套棉衣是上海留给他唯一的温暖。那时候，幸福离李文元很远。

李文元：我是1955年2月入党，我们经历过旧上海那段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日子，对党的感情十分深厚。解放后到1957年，党的理论和实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就牢牢地树立起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我的信仰。

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在上海的提篮桥区搞职工教育。当时上海刚刚解放，人才很缺，特别是教育人才十分紧缺，也是工作能力稍微强点吧，就把我充实到教育岗位。

1950年到1957年的几年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日子。工作上有了些成就，又受到领导重视，1955年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受到市里的表彰。那次表彰会非常隆重，颁发了优秀教师奖章。回到家里，父母看了后都非常高兴。我还被选为学校的团干部，每天都很忙，但开心得很。

上海刚解放时青年职工多数是文盲，好一点的有小学一、二年级的文化。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个初中部，我就在初中部担任老师。1957年因为讲了几句领导不愿意听的真话，在运动中被定为右派。

1957年全国开展了大鸣大放运动。报纸、广播天天都在鼓动所有的人向领导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关心政治、是政治落后的表现。当时统一的宣传口径是，给领导提意见是帮助改正错误，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在那个运动中，你不提意见不行，不提意见说明你与党的要求有距离；提的少了也不行，提少了说明你思想觉悟没

有跟上形势，没有真诚。天天开会、天天动员、天天鼓动我们给学校领导提意见。

最开始的时候，区上领导对提出的意见也表现出虚心接受的样子，开会时你在这里提，他在那里认真地记录。

当时年轻，只有25岁，既是党员，又是团干部，响应组织上的号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给区上领导提的意见是：不应该对知识分子一刀切式地进行改造。我说教师文化差异很大，应分层次提高，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另一个意见是上级单位对教师不重视，希望学校领导对教师的培训要有针对性，不要浪费培训资源。

提出这些意见后还受到了领导表扬。我心里还很轻松，总算是完成了大鸣大放的任务，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培养。可时间不长，风向变了，原来要求提意见，后来提出的意见全变成了反党言论。我也因为提了意见成了右派，从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一下子变成政治监督对象。

宣布我是右派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那天开会，区上的一位领导说：“有一件让大家大吃一惊的事情要宣布。”然后就开始宣布学校里右派的名单。有好几个老师都被宣布为右派，包括我。

那个会让我终生难忘，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人都傻掉了。定右派的依据是说我有反党言论。这句话让我思想上始终没有转过弯来。

当天晚上我就找到区上的一位领导，问他我有什么反党言论。领导说你提的意见是直接针对领导的，针对领导就是针对党。还说我有骄傲自满情绪。

从那天开始，我从一个对党有着坚

定信仰的骨干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的右派。在那种大形势下，没地方讲理，心里特别委屈。思想上还天天在反思，自己错在哪里，百口难辩，心灰意冷，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经常是走路腿都发软。

当时的右派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重的，是要判刑的，第二类是要送去劳动教养的，第三类是开除公职的，第四、五、六类是可以改造好的右派，保留公职，以观后效。我属于后三类，保留公职，在劳动中改造。

那段时间思想压力特别大。把我定为右派时，学校没有讲明原因，也没人让写份检查或允许我申辩，更没人找我谈话。后来党籍也被开除了，工资又被降了三级半，由原来的八十二元五角降到了六十元。所幸保留了公职。

划为右派后我就脱离了教育岗位，参加劳动，马上就离开了讲台，到上海和平公园参加建园劳动。

那时候心里特别地委屈，学校的所有同事一夜之间都躲我远远的，心里的苦闷无处诉说。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给我讲了很多朴素的做人道理。母亲不止一次地讲，再有挫折也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消除领导对你的误解。

我很感激母亲，因为只有她始终坚信我是被冤枉的。母亲还告诉我，只要好好工作，耐心等待，冤枉终会被解除。母亲最后去世了，她不知道解除对我的冤枉用了二十年。

当时我也不服气，千方百计地好好劳动，憋着一股劲要做出个样子，就是想证明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负责，想通过努力找回自尊。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

宁夏考古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牛达生（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牛达生：新中国成立时，保险业务也很少，工作不忙，还管饭，那时候只要管饭的单位都是好单位。到了1954年，有一天看到西北最大的报纸《群众日报》上有招生通告。通告上说：为了鼓励青年职工提高文化知识，大学要面向青年职工招生，叫调干生，但要参加考试。是为了培养新中国更有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单位负责党务工作的一位领导认为我年轻，有培养前途，支持我去参加考试，还放了3个月的假，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功课。我初中都没有读完，高中更没上过，所以觉得考理工科肯定不行。但我喜欢历史，文科底子也相对要好些，于是就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居然考上了。拿到通知书高兴的很，开学前从银川出发，走了4天到了西安，1954年到1958年在西北大学上了4年大学。

牛达生在西北大学读书的4年间，有三件事让他终生难忘，一件是大三时学校开设了选修课，当时他选择的是考古专门化课程，也就是后来的考古专业，这个专业课的选择打开了他后来60多年的事业之门。因为是新课程，没有师资，就从北京请了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来学校讲学。考古的神秘和古文字奇妙演

变让他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也为他今后潜心考古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和兴趣基础。有机会听当时国内一些考古权威的亲传十分难得。

第二件事是系主任老师看他忠厚老实，又肯学习，给他介绍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学老师做女朋友，谈的很投缘。第三件事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随后的反右斗争，运动初期是号召要大鸣、大放、大字报，鼓动学生和老师向上级领导提意见，说是为了帮助党整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不鸣不放的就是掉队分子。运动中，牛达生也提了点意见，运动后期因自己提出的意见还受了处分，在思想包袱的重压下，他不愿拖累女朋友，也就断了来往。

牛达生：我们是1958年毕业，那时候正准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七个同学一起回到宁夏，我被分配到博物馆。说是搞文物研究，但真正接触到的是文物工作并不多，更多的是办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展览，四清运动展、忆苦思甜展、阶级斗争胜利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展、一打三反运动成就展等。那时候运动也多，配合运动的展览也多，整天编写展览方案、收集展品、布展陈列，最后是接待观展群众。

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裘志新曾经告诉我的，在高考前裘志新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家庭出身是必填项目。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全部都有这样一个建议不录取的蓝色章子。

在得到落榜的消息后，裘志新十分沮丧，父亲也极为伤感的向他道歉说：“你读不了大学，只怨我们连累了你。”裘志新心里明白，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斩断的不仅是他上大学的梦想，当兵、招工的大门也会向他关闭。在极度的苦闷中他似乎隐隐地感觉到，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已经不属于自己，在那个处处讲究出身的年代，他必须为自己找一条新的生活出路。

落榜后的裘志新十分苦闷，他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该往哪里走，他不愿意见到过去的同学，因为被大学录取的同学在一起讨论理想与志愿、快乐与梦想时的喜悦表情对他都是深深的刺激。他不愿意回家，不愿意看到父母脸上无奈的沉默中透出的内疚，也不愿意听父母一遍又一遍的道歉。

裘志新：那段时间我整个在彷徨和躲避中，突然有一天从广播里听到一个

消息，宁夏农村要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那条新闻还比较长，写的也蛮有激情，新闻里就说宁夏是施展才干的地方、青年人到宁夏会大有作为等等，但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杭州的青年朋友，不要再等待，宁夏将张开双臂欢迎你。”你想想，在整个城市都抛弃了我的时候，能听到一句“宁夏将张开双臂欢迎你”的话，肯定会有强烈的亲切感，而且对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更像是找到了安放青春的地方，在精神上如同一支强心剂，在冥冥中似乎又看到了曙光，只是这丝曙光距离杭州十分遥远，是西部宁夏，讲真的，其他人怎么想我不好说，但我来宁夏真的是想找到人生新的曙光。

1965年夏天，杭州市政府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发出支援宁夏建设的号召。这次发出的号召没有向以往那样，对应征者的出身提出要求。表现出接纳地区的宽容，唯一的要求就是自愿。裘志新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一点犹豫，立刻报了名。

他想离开那个时时都会给家庭成分较高的人划出警戒线的城市，还想离开小资本家的父母，更想离开那个处处都能看

到同学身影、处处能听到读书声的城市。他想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另辟天地，安放青春、实现报国梦想，于是他同杭州市数千名同学一起，登上了西行列车，来到宁夏插队落户，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报名时裘志新没有与家人商量，他知道，父母对他的选择不会支持，与其天天在父母眼前让他们内疚，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没人知道他是资本家的儿子的地方独闯天地，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裘志新在刚过十八周岁的时候，登上了西行列车，向宁夏进发，以此来减轻父亲内心的痛苦与内疚。

上初中时裘志新就学过唐朝诗人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那是课本上的描写。西部宁夏的真实情况裘志新并不知道，在邻居和同学中间，宁夏在杭州人的眼里名声并不美丽，除了气候恶劣、生活艰苦和贫困外，还有着许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误解，再加上几年前大批浙江青年支援宁夏时，遇到过一些不公，大批浙江青年来宁后又返回浙江，也给宁夏的总体名声带来些负面影响。

坑，也叫钱窝子，挖开后取出了大量钱币，有好几麻袋。

刚开始我们并不能断定这就是西夏钱币，于是马上把发现的结果向单位报告，领导开始也没特别关注，就指定由我负责整理和研究，但如何整理和研究我也根本没有可参照的整理规范或办法，全部是摸着石头探路。

整理西夏古钱币是我考古研究走出的第一步，也是件非常辛苦又枯燥的工作，由于在贺兰山脚下，气候干燥，荒原又有较大的坡道，没有积水条件，所以埋藏古钱币的钱窝没有受到过多的自然侵蚀，保存的比较好，很多钱币上的花纹和模印字都能清楚地识别。我们就天天在几麻袋古钱币里翻腾，铜锈粉尘飞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经常想起上大学时西北大学的校长候外平，他讲课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搞考古的别想着早早功成名就，要穷经皓首，大器晚成，如果坐不了冷板凳，啃不了冷骨头，还可能一事无成。

整理西夏古钱币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凭着自己对考古工作的浓厚兴趣，加上学校打下的考古理论基础，让我坚持下来并从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

（李习文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报名时他找不到户口本。母亲告诉他，父亲对因家庭影响不能让他上大学十分内疚，托人帮他找到了一个临时工的活，想弥补内疚之情。也根本不同意他到宁夏。父母把户口本藏了起来，怕他冲动报名，干了傻事。

裘志新：父母的苦心相劝无法动摇我来宁夏的决心，有天父母都出去了，我在家翻箱倒柜，偷出了户口本，花了一毛七分钱，很快就办完了转粮户关系和准迁证明。办手续过程效率很高，是一条龙办理，很像现在的现场办公，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办理手续的。

当时只要办完支边手续的，街道都会给家里送来一份喜报，我父母听到这个结果后，知道木已成舟，无法更改了，尽管对我偷户口的行为和选择到宁夏十分不满，但还是日夜为我准备行装。不开心不开心，但父亲对我说：家里的东西你需要拿什么都可以带走。母亲还一边嘴里叨叨的数落我，一边连夜做了全新的厚棉衣棉裤。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西北都是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

（蔺银生 整理）

潘自力为政清廉二三事

潘自力是宁夏解放后第一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他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宁夏解放后留任，于1951年10月调回军队，在宁夏工作了两年多。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他在宁期间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公仆形象却永远留在宁夏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心中。特别是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至今有口皆碑，传为佳话。

狭小简陋的办公室

潘自力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从不借职务之便占公家的便宜，表现了一名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可贵精神境界。他虽是省委书记，住和办公都在一间马鸿逵家人住过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实际上是利用一条过道改建而成的。室内光线不足，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外加一个小壁橱，支一张床。桌上经常放一小盘水果糖，有客人来访，就是他惟一的招待品。他的夫人是位医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医院住宿，偶尔也回家转转，也只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看书看报。

经常停开的吉普车

那时机关里车辆很少，档次也很低，潘自力外出乘坐的是一辆美式旧吉普车。路程不远，他就和大家一样步行或骑自行车，所以汽车经常停放在车库里，很少开动。大家也经常看到潘书记骑自行车外出的身影。有一年过春节，天下着雪，他和省委机关十几名同志相约一起骑自行车去西马营（今中山公园）郊游。一路上雪泥交加，但他谈笑风生，兴致盎然，同行者受其情绪感染，欢声笑语不断。

简单朴素的招待餐

潘自力对上级领导的接待工作也是按规定办事，从不铺张浪费，搞特殊。1950年5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来宁夏视察工作，潘自力和省委几位同志商量如何接待。大家都知道，彭老总的脾气是不准吃好的。在研究过程中，大家感到很为难：吃的好了，彭老总发脾气；吃的差了，大家又过意不去。最后潘自力拍板：还是吃简单些。彭老总就餐后高兴地说：“好呀！简单朴素，老老实实，花钱不多，谁也不贴。”1952年9月，潘自力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以后，宁夏有几位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因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途经西安去看望他，他自己掏钱在“老童家”请吃了一顿羊肉泡馍。这件事在宁夏的老同志和民主人士中传为佳话。

（据宁夏党史网）

从长征谣到清平乐·六盘山

196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应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同志嘱书。他老人家顿时回忆起1935年10月，率领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壮丽情景。忆景中，毛主席心旷神怡，精神振奋，立即挥豪，为宁夏回、汉各族人民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78年10月，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怀念毛泽东主席，特将《清平乐·六盘山》这篇警世之作，制成高雅的横幅，敬送给中央、各省、自治区来参加二十周年大庆的领导同志和代表团成员，发给各市、县、区及驻宁解放军参加庆典的代表。“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2月初的一天，主席没有看书，也没有看报，静静的坐在窑洞里，用铅笔修饰着长征路上写的诗词。

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二万！同志们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长征谣，1942年6月1日在《淮海报》上发表后，它像革命的火炬，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在八路军、新四军、红色娘子军中，从司令员到战士，传颂着长征谣，朗颂着长征谣，有些干部、战士在向日本鬼子发起冲锋时，还高呼着：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30万大军，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946年8月，上海《解放日报》第二次发表了《长征谣》。发表前，毛主席对《长征谣》作了重大改动，词的题名由《长征谣》改为《清平乐·六盘山》，内容由自由体改为规范的词曲。改后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当年在延安的老红军、老八路；上海、北平、重庆、西安、广州的大学教授、讲师，文学艺术家、诗人，看到《解放日报》隆重发表毛主席写的《清平乐·六盘山》时，心情振奋，奔走相告，热情赞扬《解放日报》的社长、编辑，慧眼识真金。老红军、老八路欢聚在一起的时候，仰天遥望宝塔山，纷纷侃侃而谈：1942年6月1日，《淮海报》发表《长征谣》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用三年两个月的时间，就缚住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穷凶极恶的苍龙。现在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恐怕用不了那么长时间。1957年，《诗刊》创刊，第三次发表《清平乐·六盘山》时，毛主席将“红旗”改为“旌头”。1961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请毛主席嘱书《清平乐·六盘山》，毛主席又将“旌头”改为“望乡”。就是现在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从1935年12月至1961年9月，26年中，毛泽东主席三次修改《清平乐·六盘山》词章，不仅改了题目，还改了题材，删掉了多余的词句，从《长征谣》到改为《清平乐·六盘山》，越改越精，越改越好。这种创作精神，值得我们千秋万代，永远学习，永远铭记心间。

（据宁夏党史网）